
大西洋同盟的信任危機：從戴高樂的「第三條道路」到特朗普的「盟友商品化」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特朗普再次指責北約

在國際政治的舞台上，歷史往往以一種諷刺的方式重演。大西洋兩岸的傳統同盟關係，正經歷著自冷戰以來最劇烈的結構性震盪。在北約安卡拉峰會前夕及峰會期間，美國總統特朗普再度公開質疑北約作為安全盟友的可靠性，他宣稱，由於歐洲國家未能在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中提供直接協助，例如拒



北約安卡拉峰會於7月舉行。(Photo: NATO website)

絕讓美軍使用聯合軍事基地攻擊伊朗和保護霍爾木茲海峽航道，這證明了北約只是一個「單向獲益」的過時組織，但他卻沒有提及在開戰前自己沒有和歐洲盟友商議。更有甚者，特朗普在講話中竟然舊事重提，再度將「格陵蘭主權買賣」這個議題搬上檯面，以此隱喻歐洲盟友在領土與安全資源上對美國的不配合。這種將地緣政治等同於房地產交易、將集體防衛契約視為私人保鏢合約的「商人外交」風格，不僅令布魯塞爾一片嘩然，更徹底引爆了大西洋兩岸的信任危機。

然而，如果我們僅僅將這場危機歸咎於特朗普個人的性格特質或狂妄言論，無疑是低估了地緣政治的深層結構。事實上，歐洲盟友對美國「安全保護傘」的質疑並非始於今日。要理解今日大西洋同盟的裂痕，我們必須將時鐘撥回六十年前，審視那段由法國總統戴高樂所掀起的歷史風暴。

歷史的迴聲：1960年代戴高樂對北約的挑戰

1960年代正值冷戰的高峰期，當時法國總統戴高樂對美國在北約內部的絕對主導權深感不滿。戴高樂是一位擁有強烈民族自豪感與大國雄心的戰略家，他敏銳地察覺到，在美蘇雙極對峙的格局下，歐洲的命運被綁架在美國的戰略決策之上。在1956年蘇彝士運河危機和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之後，戴高樂判斷：如果美蘇之間爆發核戰爭，美國絕對不會為了

拯救巴黎或柏林，而冒著紐約或華盛頓被蘇聯核彈摧毀的風險。在戴高樂眼中，美國的核保護傘是不可靠的。

基於這一判斷，戴高樂開始積極推動法國的外交獨立，法國拒絕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堅持發展自己獨立的核威懾力量。到了1966年，戴高樂採取了震驚世界的決絕行動，他宣布法國正式退出北約的軍事一體化指揮架構，並將北約總部驅逐出巴黎。戴高樂試圖在美蘇雙極之外，為法國乃至整個歐洲開闢一條「第三條道路」，即一個「歐洲人的歐洲」，在冷戰的夾縫中維持獨立的主權與外交空間。

鏡像對比

將1960年代的「戴高樂危機」與2026年的「特朗普困境」進行對比，我們會發現兩者在結構上存在著驚人的相似點。這兩個歷史節點的核心危機，本質上都是歐洲盟友對美國戰略可信度的根本性動搖。無論是當年的戴高樂，還是今日的歐洲多國領袖，都面臨著相同的安全焦慮：當美國的利益與歐洲的安危發生衝突時，美國是否會毫不猶豫地犧牲歐洲？1960年代，戴高樂擔憂美國不願為歐洲扣動核扳機；而2026年，特朗普在未與北約盟友協商的情況下，採取單邊行動突擊開戰，隨後輿論認為他又因國內通膨壓力和選舉考量而反覆搖擺、時打時談，這種不可預測性同樣讓歐洲驚覺，美國的決策已經受制於一黨甚至一人的政治利益。特朗普指責盟友不參與美國的單邊冒險，這種道德勒索恰恰印證了戴高樂當年的預言：大國的所謂安全承諾永遠是取決於自身利益的。

根本性差異

然而，這兩段歷史雖然表面相似，其背後的驅動力卻呈現出一種「鏡像顛倒」的根本性差異。戴高樂時代的危機，是歐洲主動追求自主，當時的法國正處於戰後經濟復甦的黃金三十年，國力蒸蒸日上。戴高樂是帶著大國復興的攻勢姿態，主動去挑戰美國的霸權，試圖打破雙極壟斷。相反，二零二六年的局面則是美國主動推開歐洲，現今的歐洲（特別是法德同盟）從未主動想要與美國決裂，歐洲如今考慮戰略自主，本質上並非出於戴高樂式的浪漫大國夢，而是一種防衛性的、迫不得已的政治止蝕。特朗普政府不願意保衛烏克蘭，漠視俄羅斯對歐洲的威脅，歐洲開始意識到，為了自身的能源安全和地緣穩定，他們必須建立一條不依賴美國隨興決策的安全防線。

當代「第三條道路」的變奏與困境

今日以法國總統馬克龍為代表的「新戴高樂主義」，試圖在全球多極化的格局中，為歐盟尋找獨立的位置。然而，2026年的現實卻遠比一九六零年代殘酷。首先，歐洲面臨著

巨大的戰略能力落差，當年的法國擁有獨立且完整的國防工業與新興的核武實力；而今日的歐洲在情報網絡、戰略後勤以及核心核威懾上，對北約（實質上是美國）的依賴在短期內根本無法切斷。

其次，多極地緣的拉扯讓歐洲進退失據，戴高樂面對的是非黑即白的冷戰雙極，而今日的歐洲在經濟上高度依賴亞洲市場，本身製造業受到中國的衝擊，在安全上恐懼俄羅斯在東歐的擴張，在能源上則受制於中東的動盪。特朗普強迫歐洲在所有議題上配合美國，使得當代歐洲的「第三條道路」不再是一條通往復興的康莊大道，而更像是一場充滿地緣政治風險的踩鋼絲。

結論

面對大西洋同盟看似無解的僵局，我們是否應該走向徹底的悲觀？歷史給予了我們不一樣的答案。儘管特朗普主義在過去幾年裡對國際秩序造成了嚴重的破壞，但從美國國內的政治脈絡來看，這並不會成為美國外交的永久性新綱領。最新的民意調查與多位共和黨人公開表達不滿均顯示，美國社會與政壇內部對於這種徹底孤立主義與交易型外交仍然殘存著一點制衡與修正的力量。無論下一任美國總統是溫和派的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任何頭腦清醒的國家領袖都必然會意識到一個基本事實：無論美國實力多麼強大，全球化的相互依存網絡早已決定了美國不可能完全孤立自己。破壞同盟的代價，最終將由美國自身的全球領導力衰退來買單。

正如歷史所展示的，當年戴高樂將反美的姿態推到了極致，以為法國可以憑一己之力走出一條絕對獨立的道路。然而，隨著冷戰局勢的演變與現實利益的拉扯，法國最終仍然選擇了積極投入歐盟的深化建設，並在數十年後重新回到了北約的軍事一體化架構之中。歷史的脈絡告訴我們，極端的民粹與孤立主義或許能贏得一時的國內選票，但地緣政治的引力終究會將人拉回現實。大西洋同盟的基石或許正在經歷風雨，即使當今歐洲去美國化進程（如北約正採購歐洲製造的運輸機、長程導彈與衛星網絡以取代美製裝備）未必可以逆轉，但在修正機制下，這段歷史的波折，最終將迫使美國與歐洲重新尋找一個更具彈性、更加平等的合作範式，而非同盟的徹底終結。

2026年7月

原載於香港《時代論壇》

[更多資訊](#)

文章刊登之後，在臉書上有人轉載，在留言區有不少批評，以下一些節錄：

「作者講過，因為 Trump cut budget，佢家人有咗份工。至於是否因這樣搞到作者對人不對事，作者自己也未必清楚。因為人要了解自己是非常困難。」

「作者有一次話，美帝想佔領 greenland，是佔領歐洲的第一步，就像當年日本先佔中國東北。」

「作者經常作出搞笑的比較，不是第一次。」

「這就叫做邪惡的真心膠 他們之所以膠 就係因為真心。」

我的比較分析是否「搞笑」或者我是否「邪惡的真心膠」，這是主觀的判斷。不過，令我啼笑皆非的是，批評者將我沒有說過的話塞入我的口中，我曾經多次批評特朗普提出吞併格陵蘭是不對的，但我從來沒有說這是佔領歐洲的第一步，就像當年日本先佔領中國東北。我曾經提過特朗普削減國家科學基金和國家衛生局的預算，令一些學生失去獎學金，一些同事失去研究支援，但我並沒有家人因此而失去工作。事實上，削減研究經費的措施已經引起不少科學家的不滿，例如 Neil deGrasse Tyson，因為這的確會削弱美國的科研能力，他們是維護學術道統的勇者，絕不是「邪惡的真心膠」。Neil deGrasse Tyson 是針對事，而不是針對人，他曾經讚揚小布殊總統增加研究經費的預算，小布殊是共和黨人。
